

和西周人不知道五帝為何人。在甲骨文中，商人追溯自己的祖先只到契，周人追溯夏人的祖先只到大禹，所以，商周兩代沒有五帝的概念是事實，我們憑東周以後的文獻來考訂虞朝世系，恐怕未必符合史實。

陳氏從良渚文化的出土物或遺址等角度推斷良渚文化就是虞朝，其推論過程雖有不足，但論點確值得我們注意。反思古史研究，雖然顧頡剛等疑古派學者沒有質疑夏代的存在與否，但疑古派的「破壞」對後人重新建構虞朝及其文化確有參考價值。因為他們提醒後人注意文獻鑒別，並了解考古學、人類學、文字學的領域對古史研究亦同樣重要。虞朝是否確實存在的問題，有關研究仍在起步階段，相信對虞朝有無及具體史事之考究，仍有極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陳嘉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

鍾翀，《北江盆地——宗族、聚落的形態與發生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330頁。

聚族而居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其中猶以南方地區的浙東、福建、江西、廣東最為典型。可以說，宗族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最為明顯的社會組織形式，凡是有漢人聚居的地方，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宗族的影響（即便較晚得到開發的東北地區，甚至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因此宗族問題就成為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重要研究對象。

中國學者的研究，向來以文獻考證見長，尤其喜歡引用歷史早期特別是先秦時期的經典文獻，而海外學者則擅長於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從實際的形態出發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宗族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前，多數中國學者都把宗族形成歷史追溯到西周時期的宗法時代。而擅長於實證與形態分析的日本學者（以仁井田陞為代表），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發現宗族（擁有宗祠、族譜、族規、族田）起始於宋代，此後的日本學者（如井上徹、遠藤隆俊等）都是在這一前提下展開研究的。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所說的宗族現象，肇基於宋代。宋代以前，中國農村雖以血緣性聚落為主，但並無宗祠、族田、族譜、族規等宗族的內在因素。北宋時期，這些因素陸續出現。即便如此，宋元時期完全具備這些要素的宗族尚不多見，而到了明清時期特別是

明代中期後，同時具備這些元素的宗族已普及開來。以上這些知識就是在專門研究者（以日本學者貢獻尤著）的努力下而取得的，並逐漸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在這樣的學術前提下，新近出版的《北江盆地——宗族、聚落的形態與發生史研究》（以下簡稱《北江盆地》）便體現了宗族問題研究的最新進展。《北江盆地》一書作者鍾独，其治學經歷比較特殊。該書由其京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翻譯、修改、補充而成。與國內已出版的眾多博士學位論文相比，該書充分體現了日本學界的精益求精、小中見大、論證嚴密、分析透徹、追求完美的特色，稱得上是宗族研究領域的優秀之作。

北江盆地是分佈於浙江省東陽市北側的面積僅有256平方公里的一處中等規模的盆地，20世紀80年代初人口近三十萬。東陽民間俗稱這一盆地及周緣地區為「北鄉」，與以「南江盆地」為核心的「南鄉」相對稱。雖然其在地理環境及規模方面談不上有什麼特殊之處，但據鍾独的統計，在這樣相對封閉的小環境中卻保存有567部族譜，共有75姓、169個宗族。據日本井上徹等學者的研究，早在宋代浙東等地便開始了「宗族形成運動」，北江盆地便是中國早期宗族的「策源地」之一。該書作者充分利用現存的族譜資料，對其展開苛刻的批判、檢驗及嚴密的分析，探討了一千多年來該地宗族與聚落的變遷歷史，同時梳理了數百個宗族的空間形態與發生學系譜，並以北江盆地的研究結論為支撐，抽象出宗族起源與發展的脈絡，描繪宗族的發生、成長過程。

本書除緒論、結論外，共分六章，還附有八十多頁的「北江盆地關聯族譜目錄」、「北江盆地宗族狀況表」。

緒論在回顧了國內外特別是日本學者宗族研究史的基礎上，指出既往的研究缺乏對族譜及其流傳史的系統的歷史文獻學整理，缺乏對族譜發生與宗族形成之間聯動關係的細緻分析，而本書研究目的就是要克服這樣的不足，為宗族演化史研究提供比較明確、比較細緻的時間標尺。而其之所以選擇北江盆地，首先該地是宗族發達的典型區域；其次是出於糾正既往研究對象地過於分散的缺點；再者是該地族譜現存狀況較為理想。

第一章對文化史視野中的「浙東」與「東南中國」，東陽縣的歷史沿革、東陽縣傳統生業狀況及地方特產、土地開發及北江盆地的聚落歷史進行了總括性的描述，為後述主題的展開交待了基本的人文背景狀況。

第二章在對東南中國族譜概況進行總體介紹的基礎上，對現存北江盆地相關族譜進行了總體掃描，並進而對該地族譜的流傳、普及歷史進行簡要的介紹，指出本地族譜具有數量多、密度高、早期譜多、創修年代早、普及度

高及近年修譜事業活躍的特點。

第三章在對「鹿峰蔡氏」宗族形成與展開歷史的個案考察的基礎上，對北江盆地的聚落面貌、宗族形成背景展開了深入的探討。作者在此得出以下幾點認識：宗族結合上至為重要的大型聚落，往往與大型宗族相伴，即大村與大族伴生現象十分顯著；這樣的宗族聚落，集中形成於11-15世紀；中小聚落多由既存母村的分離移住者形成的子村，其形成歷史更為晚近；宗族內部結構與其空間分佈存在相關性。

第四章以宗族聚落的地理分佈、族譜始遷祖記錄為中心，對宗族的空間形態作出發生學的分析，並對8世紀以來北江盆地及其周邊地區的宗族發生趨勢作了統計分析。通過族譜記載的始遷祖記錄，作者發現宗族集中形成於11-14世紀，並指出北江盆地出現的宗族社會歷史變遷，並非是孤立事件，而是浙東鄉村廣泛發生的社會歷史現象。

第五章梳理了北江盆地相關族譜的編纂史，並以族譜中向來未受重視的女性配偶記錄為突破口，對族譜的始遷祖重構模式及此類記載的真偽判別展開了深入分析，對族譜編纂者的意識及其背後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進行了探討，指出南宋以來浙東地區宗族逐漸發達，到了元末明初得到了朱子學正統的支持而成為宗族的一個重要策源地，明代中期以來宗族組織越趨發達、普及，最終成為宗族的發達區域。

第六章以集中分佈於東陽縣及近鄰地區的「斯姓」為中心，通過其空間分佈及宗族形成史的細膩整理，為漢代以來當地土著居民社會如何演化為宗族社會作出了範例式的揭示。通過對浙東斯姓由近及遠的歷時性考察，作者注意到：自越人、漢人交替期以來，像斯姓這類東南地方的土著族姓，首先由山越族部族演化為漢化的地方性世家家族，到了宋元時期，再由世家大族式的結合演化為以父系血緣的普遍聯繫為特徵的宗族。

結論部份對前面的探討進行了總結與歸納，並提示該項研究對東南中國歷史研究的啟發性意義以及今後的研究方向。

通讀全書，可以明顯感受到作者是在充分總結歷史學、人類學界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指出先行研究不足之處，然後把焦點對準東南中國的一個小盆地，圍繞該地存在的宗族現象進行抽絲剝繭式的實證分析，對宗族早期形態及演變歷史進行學理上的演繹。這樣的研究視角，是作者充分運用歷史地理學背景而展開的，也是該書區別於既存所有成果的一個重要特徵。特別是作者親手製作了大量的地圖與統計表格、統計曲線圖等，把非常複雜的問題進行了抽象化與圖像化，為讀者理解地域社會宗族的發育形態提供了簡捷有效

的表達方式，也是作者接受日本人文地理學訓練的重要結晶。可以肯定，這樣的表達方式將為國內學術界深化宗族研究提供一個重要啟示。

在論證的嚴密性及分析的透徹性方面，該書也做得非常成功。雖然近年來博士論文如雨後春筍般出版，但大多數著作的論證演繹淺輒而止，泛泛而談，多有言猶未盡的遺憾。但鍾翀博士的著作卻給人以酣暢淋漓的感覺，這方面的功力是作者多年來努力的結果。從其後記中可以看出，早在1998年作者就開始注意東陽的宗族問題，此後在這一領域堅持不懈，並接受了京都大學嚴謹的學術訓練，成就了作者嫻熟的資料運用與細緻分析的能力。

第六章通過斯姓宗族近二千年的歷時性考察，對宗族形成前的血緣聚落與宗族形成史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大膽探索性的論證，這樣的範例就筆者愚見，實有較大的創新意義，為認識中國宗族的形成歷史提供了絕佳的範例。今後這樣的研究應大力進行，只有這樣才能把歷史剖面圖連續不斷地描繪出來，讓今人從「移民傳說」的假象中幡然醒悟，並洞悉由古及今的歷史邏輯。

當然，與以傳統歷史文獻為基礎展開論證的歷史學者的研究途徑相比，本書作者對歷史文獻的閱讀、利用上還有待加強。中國歷史文獻浩如煙海，宋元明清時期有關宗族及地域社會諸事象的文獻比比皆是。相對來說，本書作者運用傳統文獻的努力做得還似欠缺，這從引用文集的數量上可以窺見一斑。作者賴以論證的資料多數都是清代中期以降刊刻的族譜文獻，這類文獻的真實性向來為歷史學者詬病。今後作者如能充分浸潤傳統歷史文獻，擷取先賢達人所留下的珍貴記錄，則可以作出更令歷史學界信服的科學研究。另外，文中的某些概念如中古、中世、近世等交代得不夠清楚，讓讀者很難把握作者的真實含義。還有作者計算傳統宗族世代（近代以前）時以30年為準，這與筆者習見的25年為準有所誤差。

總體而言，這是一部富有啟發意義的力作。

朱海濱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